

# 马峰：印度尼西亚华文小说的柔性叙事 4

族群的自我省思，这是对道德伦理的正向诉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个体视野的族群局限，过于主观情绪化也限制其批判的社会深度。

唯美式的情感抚慰并不限于女作家，一些男作家也表现出对纯美爱情的珍惜，这些柔性书写都展现出两性完美的感情憧憬。阿蕉对婚姻题材颇为用心，他的小说充分诠释了夫妻间的情深义重。《我不爱你了》是夫妻相伴一生的爱情故事，在“不爱”的戏谑话语中却潜藏着深入骨髓的真爱，这是触人心扉的美好、温馨而又甜蜜的幸福家庭。当然，深情的爱恋并不代表能圆满地步入婚姻殿堂。阿五的《杏子》就表现了医科大学毕业生唐由与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生杏子的理智爱恋，他们知道彼此生活的方式与原则存在很大差异，也冷静地意识到在婚姻上结合不来。因此，他们没有贸然决定婚恋，而是选择淡然地相爱，真诚的“爱”具有相互关怀、欣赏、爱慕的纯洁性。对于爱情的反思，考究起来则主要是婚姻出路的问题。剖析本土两性之间存在的现实差异，是反思婚姻幸福的照镜。在高尚情感的感知前提下，男女思考婚姻结合的可能性需要经受生活压力的考验。然而，真诚情感是维持两性关系的主脉，倘若双方达至共识与共退思想，一段美好的爱情便油然而生。理想的追求需要突破现实的窠臼，从而在两性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基础，由此“梦幻情

缘”或“完美家庭”才能落到实处。

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权至上的地位不可动摇，而腐化的纲常伦理秩序也同样存在于华人社会。刘昶的《回到她身边》是浪子回头题材，在道德反差中凸显反思性。在婚姻与经济价值挂钩的背后，其实是道德与物质的冲突。主人公忏悔意识与真情的回归，是对极端利己主义的批判，集中诠释了爱的价值与真谛。男性的自我反思固然重要，但是女性绝不应该只是隐身于文本中的失语者。在印华小说中不乏新式女性的典型，作品常描写出女性追求自我的个性觉悟。白羽的《飞出笼的鸟》算是为女性正名的代表，当黄太被丈夫背叛后，她决定走出家庭，要做一个职业女性，坚信自己不附属于男性的生存事实。文本凸显出男女平等的新时代特质，而男性传统的威权地位正被消解。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大男子主义将受到严峻的批判与反击。女性不再安于被男性摆布的现状，不再据守传统婚姻的创伤一隅，她们开始以自主意识争取女性应有的正当权益。

对于情感的忠诚问题，在批判男性负情的同时，也有大量反思女性的题材。其一，批判女性的滥情，剔除男性的视角偏见，这种执迷不悟的情感乱象值得进一步反思。女性对于出轨竟然生出一种浪漫心态，凡若的《少奶情缘》、《薇薇的淡愁》中的女主人公对待“三角恋”都暧昧且沉迷。

如果在两性和谐的观照之下，女性发挥其阴柔特质以抚慰或填补男性隐密的精神空虚，那么塑造女性追求完美感情的愿景并无善恶之分。在自然性方面，力比多是一种本能的力量，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在社会性方面，它无疑有一种奇特的感性功能，促使两性排除万难达致妥协的状态。对于两性关系中的同居（或姘居）话题，如果男女在感情上各持己见，坚持反常规的生活理念，那么肯定无法承受时间的考验以及道德的藩篱。背离常规必然会遭遇异样目光，出轨者之间始终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而这段距离是拉远感情的隐形鸿沟。双方一旦觉悟，爱情就如泡沫般破灭。

其二，对于女性背弃者，借男性之善予以回视，意在让追求物欲者走向道德忏悔。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是一些本土女性无法追求幸福婚姻的关键，好高骛远的物质追求也凸显女性意志力的薄弱，有的甚至从家庭妇女堕落为社会罪犯。还有一些女性拥有张扬的个性，她们在物质富足之余，又要面对精神空虚。对于过去青春年华的真挚情感，她们在悔恨中掺杂着自我怜悯与反思。阿五的《红珊瑚的故事》中的小伍一心想让丈夫弃教从商，由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而离婚。实际上，她既有女强人的自由奔放，也有对感情的执着诚挚，正像一株傲视汪洋的“红珊瑚”。“很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他的身边，

重新开始过一段宁静和睦的晚年，也算了却一股对小杨弥补前愆的心愿。”不过，作者对小伍显然贬大于褒，她的心语也象征着自我的反省与纠错。

印华作家对爱情的书写有着针砭现实的批判性，尤其体现于婚恋的悲剧题材。刘昶《终身的遗憾》以殉情书写对真挚爱情的执着，由于不堪现实社会的精神鞭笞，思想单纯的青年人成为无辜牺牲品。丘安东的母亲与人私通，父母离婚后公公便把他称为“杂种”。他一直背负莫须有的“私生子”恶名，无形的道德评判催生其强烈的自卑感。这种家庭破裂造成的心灵创伤让其一再逃避现实，他的爱情与工作也由此遭到诸多变故。当他遇到凤妮，开始对自由爱情充满信心。他们彼此忠贞，两人都有超越世俗舆论的勇气，但是终究抵不过现实社会的道德压制，安东最后选择服药自杀。作者在“后记”中有所交代，安东的自杀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它缘起于1980年左右在万隆华人社会发生的三宗自杀案。这些自杀案都是年轻人的婚恋悲剧，其中安东的案例最鲜为人知。“我把故事记下来，以纪念他那短促而悲惨的生命历程。”这出凄美的爱情故事揭露了社会舆论的杀伤力，其批判锋芒直击华人的家长作风与道德伪善。

## 余论

印华作家的柔性书写只关注华族内部的症

结，爱情题材相对于华文封闭及同化政策并不敏感，但有些仍不乏政治或文化寓意。面对外在的社会纷杂，内在的情感观照不失为族群的自我排解策略。回溯印尼时局，政府对华族与华社进行打压，企图削弱华族的生存根基，对华人文化及华族身份也不予认同。当时的政治处境对华社极其不利，基于一种族群的自我抚慰心理，华人往往生成情感的内化模式。女性对爱情的唯美书写成为追求理想婚恋的一大途径，而男性的古典文化想象则大大超出了爱情维度。华人在本土的现实压抑促成向外的情感宣泄，然而女性远嫁异乡的憧憬或男性负笈他乡的愿景并不具有普遍性，这种对异国他乡的向往之情只是一种带有政治寓意的离散想象。华族如果想要疗愈族群创伤，那就必须通过内化本土来建构自我，因此借爱情中的追逐名利、道德失序、价值观失衡等来揭示华社弊病就成为强有力的反思路径。在华文封闭期，爱情题材成为印华作家的主要情感宣泄渠道。不过，在1998年民主改革以后，再过分偏重华族爱情题材就显出创作的疲态，也给读者一种“审美的焦虑”。对于当前的印华文学而言，不要耽于婚恋迷局或日常琐碎，不要禁足于自我言说的华族堡垒，而是需要有更开阔的社会视野。

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